

文章编号: 1000-5862(2021)01-0103-08

# 鄱阳湖滨湖区农户生计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曹敏珍<sup>1</sup>, 郑林<sup>1\*</sup>, 李鹏<sup>2</sup>, 田青<sup>3</sup>, 徐佳萍<sup>1</sup>

(1.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3.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理学院, 华盛顿 22030)

**摘要:** 基于2007年和2018年鄱阳湖滨湖区永修县、新建区、德安县与庐山市4个县级行政区域的7个样本村的农户生计调查数据, 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 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生计多样化指数和优势生计收入比例及Logistic回归等方法, 分析不同县域的农户生计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变化。研究结果表明: (i) 滨湖区近城型比远城型村落更具生计优势, 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存量占比较高, 物质资本存量降低, 人力资本较短缺, 尤其是教育; (ii) 滨湖区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增幅明显, 且外出务工比例与农户受教育程度成正比, 农户生计策略趋于兼农化和非农化; (iii) 2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 滨湖区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逐渐由单一的自然资本转变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的综合作用; 人力资本已成为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关键因素, 与物质资本共同影响非农型农户的生计策略; 滨湖区农村家庭的生计和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家庭生计资本, 而且还受到国家土地政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关键词:** 生计; 农户; 生计变动;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C 912.8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57/j.cnki.issn1000-5862.2021.01.15

## 0 引言

生计策略是一种为达到生计目标而开展的生计活动与选择<sup>[1]</sup>。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城乡间联系不断加强, 农村劳动力纷纷向城市转移, 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化逐渐向兼农化、非农化转型<sup>[2]</sup>。农户作为农村地区经济活动的主体及基本决策单元, 其生产和消费行为是基于特定资本状况下所做的决策选择。农户生计深刻影响城乡面貌, 同时重塑农村家庭的农业生产行为也会间接影响农村自然、社会经济发展<sup>[3-4]</sup>。在当前乡村振兴、城乡融合背景下<sup>[5]</sup>, 农户生计策略转型是乡村发展的必然趋势<sup>[6]</sup>。

国内外学者对农户生计的研究主要围绕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对农户贫困问题进行多角度研究, 涉及生计脆弱性<sup>[7]</sup>与生计多样化<sup>[8-9]</sup>、生计策略与生计资本关系<sup>[10-12]</sup>等。现有对农户生计策略与生计资本关系的研究关注了在特定自然环境下农户的生计响应。如在典型山区中, 金融资本及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影响显著<sup>[13]</sup>; 在典型

沙漠化地区中, 农户对传统农业及自然资源依赖性较高, 人力资本是农户决定生计策略的关键<sup>[4,14]</sup>; 在半农半牧区中, 农户生计资本存在空间异质性, 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是农牧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sup>[15]</sup>; 在城郊区中, 农户生计策略分化较明显,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成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sup>[2]</sup>。然而, 相关研究案例常见于西部农村地区<sup>[16]</sup>, 多采用单一年份的截面数据进行生计分析, 未能深入分析生计组成要素之间的作用<sup>[17]</sup>。此外, 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特定政策背景, 难以反映农户效益的提升与政策变化的联系。生计策略作为农户决策的连续过程, 从动态视角考察农户生计变动更有利于准确把握其生计状况。当前农户生计策略变动研究集中在分析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 如不同海拔之间<sup>[18]</sup>、生态移民搬迁前后<sup>[19]</sup>。还有从户主性别与生计多样化<sup>[20]</sup>、贫困脆弱性<sup>[21]</sup>、生计策略对农地利用的影响<sup>[22]</sup>等角度来探究农户生计策略变动。关于农户内部资本状况对生计策略影响的研究尚少<sup>[23-24]</sup>。因此, 本文从农户生计动态视角, 讨论粮食主产区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并识别在不同时期内影响农户生计选择的关键因素。

收稿日期: 2020-09-2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6010535),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课题(XDA23100202)和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级创新基金资助项目。

通信作者: 郑林(1960-)男, 江西南昌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区域规划与城乡发展研究。E-mail: zl5366@126.com

鄱阳湖滨湖区位于“三区一片粮食生产基地”<sup>①</sup>之一的鄱阳湖平原区西侧,粮食产量占鄱阳湖平原区总产量的 12%,是江西省重要的粮食输出地,其农户生计问题关乎地区粮食安全。然而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视角对鄱阳湖平原进行多角度分析<sup>[25-28]</sup>,缺乏从微观视角分析在政策变化下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因此,本文根据滨湖区 2007 年和 2018 年农村发展背景,量化滨湖区小农生计的变化特征,对其生计资本进行分析,深入了解农户生计策略转变过程,探索滨湖区农村居民生计演变机制,并提出改善农户生计的政策建议。

## 1 研究区概况

鄱阳湖平原区是由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等 5 大水系冲积而成的滨湖平原区<sup>[27]</sup>,是中国重要的水稻产区之一。本研究中的鄱阳湖滨湖区在行政单元上共涉及 4 个县级行政区域,面积约为  $6.6 \times 10^3 \text{ km}^2$ ,占鄱阳湖区总面积的 32%(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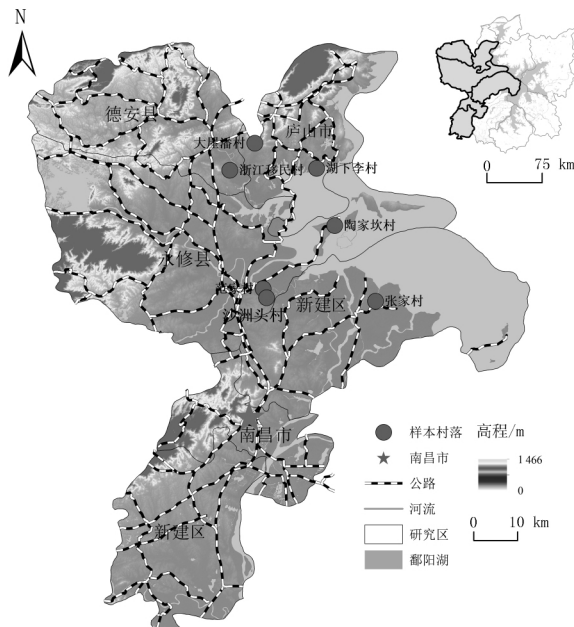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区概况图

选取滨湖区的原因主要为:(i) 鄱阳湖西部、西南部农村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高于其他地区;(ii) 受城镇化的影响,该区域农户生计转型明显,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增加,农业人口占比由 45.1%(2007 年)降为 17.8%(2018 年)。鄱阳湖区是中国洪涝灾害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鄱阳湖滨湖区作为重点洪灾风险区,其农户生计深受洪灾威胁和冲击<sup>[25]</sup>。近年来,随着鄱阳湖周边防洪堤坝的建

立,洪灾风险减弱,有利于滨湖区乡镇经济的发展,使得不少农户参与到非农活动中。农户生计渐渐脱离对土地的依赖,增加了非农收入,减少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土地利用下降、耕地撂荒<sup>[27]</sup>。

## 2 数据与方法

###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依据本课题组 2007 年在鄱阳湖滨湖区内调研结果<sup>[29]</sup>开展农户生计变动研究。样本村选取主要包括 2 个方面:(i) 对滨湖区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样本村<sup>[13]</sup>。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包括比例 1:250 000 的居民点、道路、河流、湖泊、海拔、县区行政边界和城镇行政区域等数据,绘制鄱阳湖边界图,按自然环境(海拔和洪灾风险)和经济环境(距离县中心远近,其中 5 km 以内归类为近城型,5 km 以上归类为远城型)进行分层,选出 8 个样本村。将这些村庄按海拔和距县城的距离形成一个  $2 \times 2$  的矩阵,从中确定 4 种类型的村庄(高海拔近城型、高海拔远城型、低海拔近城型、低海拔远城型),每种类型的村庄各 2 个。有关采样点选取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文献[29-30]。(ii) 在 2018 年实地考察中,受村落合并、搬迁影响的德安县周家桥村(低海拔近城型)调查数据无法跟踪。因此,确定 7 个样本村,进行村落随机取样,分布于新建区(张家村低海拔远城型)、庐山市(大屋潘村低海拔远城型;湖下李村低海拔远城型)、德安县(浙江移民村高海拔近城型)、永修县(陶家坎村高海拔远城型;沙洲头村高海拔近城型;范家村高海拔近城型)4 个区域(见图 1)。

问卷调查对象以户主或每个家庭的成年劳动力为主,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人口基本信息、家庭各项生计资产情况、农户主要生计方式、社会关系、当前生活满意度及未来生活的期望等。在正式调研中,与农户定性访谈会依据农民对这些因素影响程度的回答,结合其家庭特征而展开,每户调查时间为 40~70 min。另外,调查中与每个村的干部及地方政府官员(县处级 5 个、乡镇科级 5 个)进行了正式与非正式的访谈。在村干部或当地村民陪同下参观每个样本村农田,了解农田基本情况,以深入了解农户生计状况。本文数据分别包括 2007 年和 2018 年课题调研结果,共 344 份有效问卷,每年度调研获得问卷数均为 172 份。参考文献[4, 31]将研究区农户按

①三区一片粮食生产基地是指鄱阳湖平原区、赣抚平原区、吉泰盆地粮食主产区和赣西粮食高产片。

照收入来源分为兼农型( 50% ≤ 非农业收入占比 ≤ 90%)、非农型( 非农业收入占比 > 90%)、农兼型( 10% ≤ 非农业收入占比 < 50%) 和纯农型( 非农业收入占比 < 10%) , 这里非农业收入占比是指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相较于 2007 年的村落随机调研结果, 2018 年研究区非农型农户最多, 共 123 户, 占 72% ( 2007 年 60 户, 占 35%); 兼农型次之, 共 36 户, 占 21% ( 2007 年 71 户, 占 41%); 农兼型 11 户, 占 6% ( 2007 年 26 户, 占 15%); 纯农型 2 户, 仅占 1% ( 2007 年 15 户, 占 9%)。调查发现, 农户土地利用方式在这 10 年间也出现了变化, 即“双改单”现象突出, 经济作物种植产量增加, 土地流转现象突出。

2.2 研究方法

参照已有生计资本量化研究<sup>[11-13]</sup>, 首先, 对滨湖区的自然条件、农户特征进行标准化处理, 设置生

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 其中劳动能力及教育依据年龄和实际受教育年限赋值。通过调查获取的指标数据量纲和单位均不一致, 且不同指标对生计资本的贡献有正有负, 为消除其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本文运用极差方法<sup>[11]</sup>对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见表 1)。

其次, 引入生计多样化指数<sup>[8, 32]</sup>反映农户家庭生计多样化、专业化的程度, 即对农户从事的每种生计活动赋值为 1, 如农户家庭有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外出打工的, 其生计多样化指数为 3。同时对每个类型的农户家庭其生计多样性指数取平均值, 则得出不同类型的农户家庭生计多样化平均值。农户家庭主要从事的生计活动的收入占整个家庭收入比值的平均值, 即为优势生计收入占比<sup>[22]</sup>。

最后, 因变量是农户生计策略属于定性的分类变量。Logistic 模型在解释只有 2 种输出结果的定型变量时, 预测的结果和准确性较高<sup>[4, 33]</sup>。

表 1 鄱阳湖滨湖区农户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

资产类型	指标	赋值	权重	
			2007 年	2018 年
人力资本( <i>H</i> )	劳动能力 <i>H</i> <sub>1</sub>	> 70 岁的老人、0 ~ 11 岁的儿童和丧失劳动力者 = 0; 12 ~ 18 岁的少年和 61 ~ 70 岁的老人 = 0. 5; 19 ~ 60 岁的劳动力者 = 1	0. 013 1	0. 011 0
	教育 <i>H</i> <sub>2</sub>	文盲 = 0; 小学 = 0. 2; 初中 = 0. 4; 高中或中专 = 0. 6; 大学及以上 = 1. 0	0. 017 0	0. 018 4
	劳动力数 <i>H</i> <sub>3</sub>	家庭成年劳动力人数 / 人	0. 009 0	0. 016 4
自然资本( <i>N</i> )	户拥有耕地面积 <i>N</i> <sub>1</sub>	土地未发生流转时农户拥有耕地面积 / m <sup>2</sup>	0. 028 0	0. 043 4
	户实际耕作面积 <i>N</i> <sub>2</sub>	农户家庭实际耕种面积 / m <sup>2</sup>	0. 046 4	0. 198 7
	作物种类 <i>N</i> <sub>3</sub>	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种植种类	0. 024 0	0. 045 2
	耕地质量 <i>N</i> <sub>4</sub>	单位产量大于村平均水平为 3, 单位产量等于村平均水平为 2, 单位产量小于村平均水平为 1	0. 020 8	0. 006 8
物质资本( <i>P</i> )	住房情况 <i>P</i> <sub>1</sub>	无 = 0; 土坯房 = 1; 砖木房 = 2; 砖混房 = 3	0. 004 3	0. 002 5
	农机具及耐用品数 <i>P</i> <sub>2</sub>	家庭农业机械、出行工具和家电等耐用品数 / 个	0. 015 7	0. 015 6
	城里购房 <i>P</i> <sub>3</sub>	城里是否购房, 有 = 1; 无 = 0	0. 323 8	0. 149 7
金融资本( <i>F</i> )	总收入 <i>F</i> <sub>1</sub>	家庭年收入 / 元	0. 029 5	0. 026 6
	贷款 <i>F</i> <sub>2</sub>	贷款金额 / 元	0. 213 3	0. 187 2
社会资本( <i>S</i> )	人情往来 <i>S</i> <sub>1</sub>	年度人情往来支出 / 元	0. 070 7	0. 041 9
	公职人员 <i>S</i> <sub>2</sub>	亲友中有无公职人员, 有 = 1; 无 = 0	0. 184 4	0. 236 5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

收入是农户生计选择的根本。对比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发现( 见图 2) , 2018 年农户整体生计明显改善, 其中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明显提高, 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下降, 人力资本一直处于较为匮乏状态, 近城型受教育水平偏高于远城型。近城型比远城型村落更具生计优势。

生计资本的整体变化会受个别生计资产( 如户实际耕作面积、城里购房等) 的变动影响。在自然资本中, 户实际耕作面积权重从 2007 年的 0. 046 4 增加到 2018 年的 0. 198 7。随着土地流转和农业补贴政策的推行, 掌握丰富种田经验的农户为增加农业收益而租赁他人土地, 承包范围延伸至本县以外的村庄。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样本农户的内部差异拉大, 权重变化较大。家中公职人员对国家各种政策、方针的把握, 对农业种植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这种社会联系是获得村庄( 如鱼塘) 经常稀缺的特

殊资源使用权合同和获得商业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 村领导能更好地了解外部环境, 因此更了解商业机会. 研究区农户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0.02), 劳动力数量(0.02)和质量状况不佳, 人力资本偏低(0.02). 大部分年轻的农村非农劳动力社会关系网络较单一, 所从事的职业大部分分布在低技能的体力型行业中, 如建筑业、服务业, 这与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有关. 而对于高中(或以上)教育水平的家庭工资收入较高, 有较大比例与政府有联系. 此类农户长期生活在城市, 返乡务农的概率下降, 一般在城市中有住房. 在2007年仅有5.8%受访户在城里有购房, 到2018年占比达36.0%, 其中76%的农户家庭

表示自家房屋价值在20万以上. 调查发现, 50%以上农户通过贷款在城里购房, 还款金额(2018年平均67991.9元/户)成为家庭支出的一项较大开支,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农户家庭的生计选择.

本文研究结果发现: 2007—2018年鄱阳湖滨湖区农户家庭总收入权重较低, 贷款权重较高. 实际上, 家庭总收入作为家庭生计的根本, 这反映出鄱阳湖滨湖区农户家庭从以农为主到非农居多的现实状况. 贷款金额又可以反映家庭生计的需求变化, 随着生计转型的出现, 样本农户内部差异更为明显, 使得权重偏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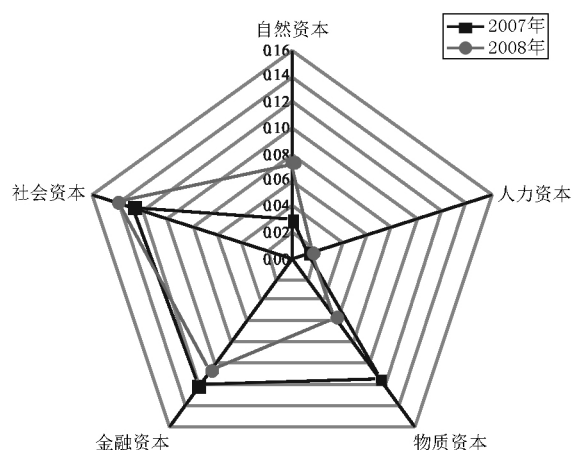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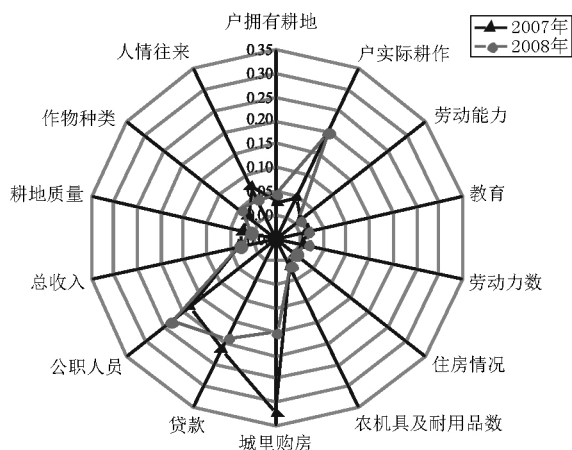


图2 农户生计资本变化

### 3.2 农户生计策略分析

3.2.1 不同生计策略农户家庭特征 在不同生计资本状况下, 年龄和教育水平是农户生计策略差异的主要原因. 调查显示(见图3、图4): 相较于2007年, 非农型成年劳动力数占比增加9%, 成年劳动力以26~30岁为主, 同时向26~35岁、51~60岁年龄段延伸, 年龄结构总体趋于高龄化. 其他类型农户数仅占总户数的28%, 成年劳动力占比减少15%, 年龄结构变化不大. 成年劳动力整体受教育年限呈

上升趋势, 达到初中文化. 近城型的村庄受教育程度比远程型更高. 农兼型农户和兼农型农户受教育程度达初中水平, 非农型农户为小学. 总体上, 滨湖区农户教育水平偏低, 影响着地区农村发展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一般来说, 农户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倾向于外出务工、创业. 滨湖区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普遍在外地定居, 人才流失严重. 而对于滨湖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非农劳动力, 脱离农业生产从事收入相对较低的行业, 生计风险主要来自市场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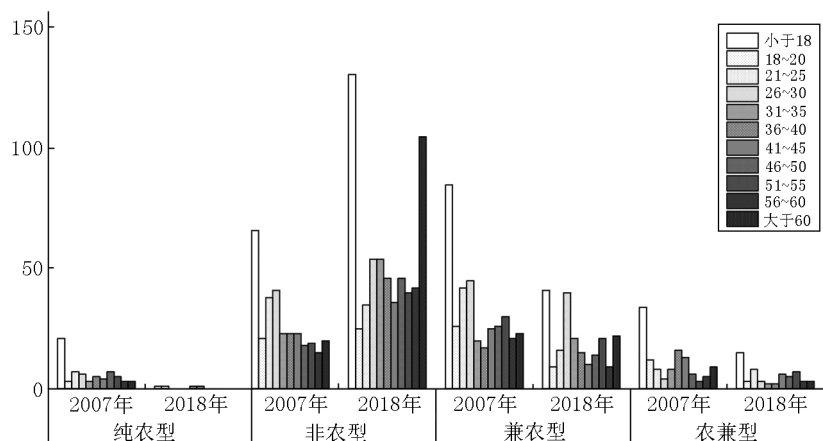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类型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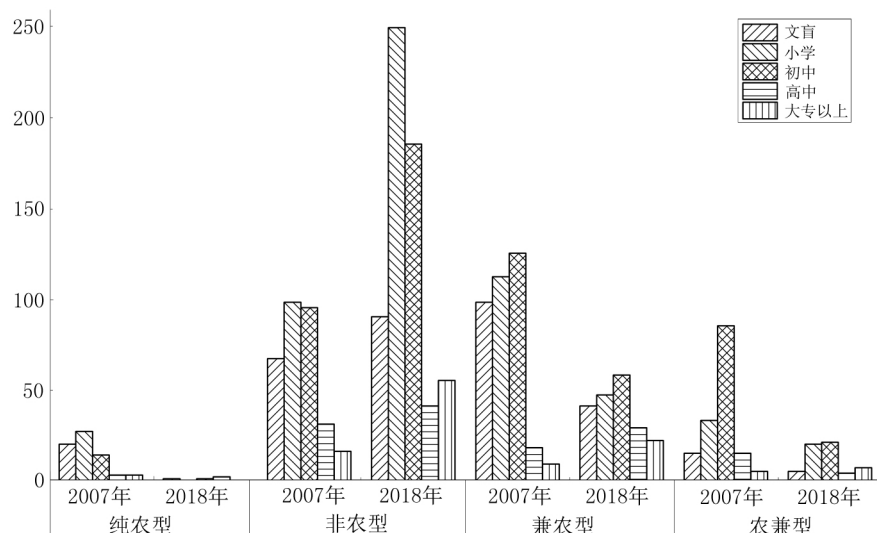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类型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变化

### 3.2.2 不同生计策略农户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

对比2007年和2018年不同类型的农户家庭收入4种类型农户家庭收入都有明显上升(见图5)。2007年4种类型农户家庭收入普遍偏低,2018年,农户收入差距有逐步扩大趋势。其中,农兼型农户收入较2007年增加8.4倍,收入增长速度最快;纯农型农户增加3.0倍,收入增长速度较慢;非农型农户和兼农型农户收入均增加4.7倍。随着乡镇经济的发展,农户生计呈非农化特征,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发生根本变化。农业收入占地区农户家庭总收入比例下降,非农收入占比明显提升。2018年,永修县沙洲头村和范家村、庐山市大屋潘村和湖下李村、德安县浙江移民村非农收入占比90%以上,而永修县陶家坎村、新建区张家村非农收入占比70%以上,较2007年所有样本村非农收入占比均增加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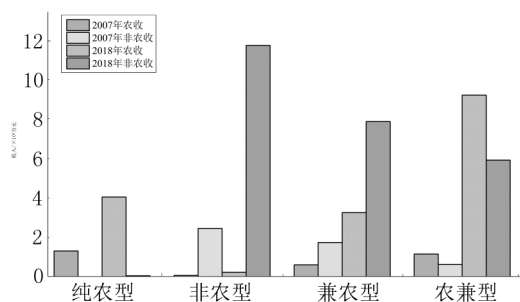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类型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对比

随着农户生计策略的调整,单纯依赖农业生产维持生计的农户变少,大部分转向非农行业。依赖农业种植的职业农户依靠技术和机械化生产,选择承包更多土地增加农业收入,同时也承担着巨大风险。而耕地面积有限的农户,则倾向于选择收益比小规模水稻种植偏高的兼农或非农活动。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将土地承包给农业大户,既获取租

金,又节省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对比见效快、回报率高的非农活动,农业种植成本较高、受灾风险较大、收益较少。

3.2.3 农户生计策略的调整 生计策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生计变动是指在考察期间农户生计策略的变化趋势。鄱阳湖滨湖区农户生计策略存在2种状态:维持型生计和多样化生计策略。根据表2,非农型优势生计收入比例呈现递增趋势,纯农型、兼农型和农兼型家庭优势生计收入减小。2007年,15户纯农型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农业收入,优势生计占比为99%,农业单一化程度高。2018年,纯农型农户优势生计专业化程度降低,从事非农活动收入比例增加明显。

多数农户满意目前家庭的生活状况,生计策略存在很强的惯性。兼农型农户和非农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呈先降后升趋势,而纯农型农户和农兼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呈上升趋势。兼农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一直较高,纯农型农户偏低。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农业,今后可能会通过从事非农活动增加家庭收入。如位于市中心附近的德安县的浙江移民村,不少农户在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下,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如蔬菜、蛋禽等)获取更多收益。拥有良好农田灌溉系统的新建区张家村,兼农型农户和非农型农户除从事本地务工以外,一部分兼农型农户意向是减少作物种植面积,将土地出租获取可观的租金收益,从而外出务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随着农户逐渐放弃一些非优势生计活动而选择优势生计,非农型农户专业化程度继续提高,生计多样化指数降低,生计策略总体趋于稳定。庐山市湖下李村地处偏僻,土地大多通过

丘陵开垦而获得,村庄家庭大多依赖非农就业,未来趋向于可观的非农业收入。

表2 农户优势生计和生计多样性指数占总收入比例变化

农户类型	优势生计占比		生计多样性指数		
	2007 年	2018 年	2007 年	2018 年	预测
纯农型	99%	95%	1.8	2.0	2.4
兼农型	74%	72%	4.2	3.9	4.1
农兼型	68%	60%	3.3	3.7	4.0
非农型	97%	98%	3.6	3.2	3.3

### 3.3 农户生计变化的影响因素

3.3.1 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 回归分析能够解释,教育、城里购房、户实际耕作面积、耕地质量、农机具及耐用品数量是影响鄱阳湖滨湖区农户生计策略的重要生计资本指标(见表3)。2007 年农户家庭实际耕作的面积越多,对农户采取兼农型

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18 年,户实际耕作面积、耕地质量、农机具及耐用品数量对兼农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农户拥有较多的户实际耕作面积、土壤肥力、工具及耐用品数量时,农户不会放弃原有的农业活动,选择兼农型的生计策略可能性大。滨湖区作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其水稻种植自然环境优越,在推动土地流转和农业补贴政策下,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计的农户倾向于通过租赁土地,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从而增加收入来源。

相较于 2007 年,教育已变更为影响非农型农户生计策略的重要因素。2018 年教育与城里购房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影响均达到显著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户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创业,依靠非农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表3 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回归结果

项目	2007 年			2018 年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发生比率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发生比率
常数	-0.382	1.535	0.683	-2.445	1.835	0.087
劳动能力	-0.475	0.548	0.622	0.076	0.527	1.079
教育	-0.235	0.377	0.791	-0.749*	0.467	0.473
劳动力数	0.394	0.504	1.483	0.138	0.474	1.148
户拥有耕地面积	-0.150	0.125	0.861	0.100	0.079	1.105
户实际耕作面积	0.326***	0.106	1.385	0.235***	0.065	1.265
耕地质量	0.361	0.409	1.002	0.697*	0.456	2.008
作物种类	-0.093	0.114	0.960	-0.279	0.196	0.756
住房情况	1.353	0.351	1.434	-0.596	0.470	0.551
农机具及耐用品数	0	0.112	0.911	0.101*	0.066	1.106
城里购房	0.212*	0.845	3.867	-2.559***	0.942	0.077
总收入	0	0	1.000	0	0	1.000
贷款	0	0	1.000	0	0	1.000
人情往来	0.002	0	1.000	0	0	1.000
公职人员	-0.041	0.549	1.236	-0.260	0.855	0.771

注:\*\*\*、\* 分别表示在 0.01、0.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检验显著。

## 4 结论与讨论

### 4.1 结论

本文以鄱阳湖滨湖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获取数据,对比 2007 年和 2018 年农户生计策略动态变化,分析不同阶段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1) 滨湖区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存量占比较高,物质资本存量降低,人力资本较短缺(尤其是教育);近城型村落受教育水平高于远城型村落,近城型比远城型村落更具生计优势;

2) 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事的劳动类型与家庭的

收入水平有直接关联;4 类农户家庭收入上升明显,非农收入成为农户家庭重要收入来源,且外出务工比例与农户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兼农化和非农化是鄱阳湖滨湖区农户主要的生计策略;10 多年经济发展改变了该地区农户传统的生计特征,目前鄱阳湖滨湖区农户生计策略处于多样性向兼业化发展阶段,未来有望朝着生计专业化、优势生计主导的阶段发展;

3) 滨湖区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逐渐由单一的自然资本(户实际耕作面积)影响转变为自然资本(户实际耕作面积、耕地质量)与物质资本(农机具及耐用品数量)的综合作用;此外,教育已成为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关键因素,与城里购房共同

影响非农型农户的生计策略;滨湖区农村家庭的生计和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家庭生计资本,同时还受到国家政策(特别是经济发展和土地政策)以及宏观层面的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 4.2 讨论

1) 通过对比 2007 年和 2018 年鄱阳湖滨湖区农户生计,直观反映了滨湖区农村发展的质量与水平;由于不同类型的农户生计资本状况不同,生计策略选择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其生计结果也各异;地方政府在引导不同类型农户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且保障地区粮食安全的同时,应积极鼓励剩余劳动力就业转移;重视地区教育,提高滨湖区农户劳动力素质;

2) 在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过程中受方法局限,部分指标权重在 2018 年明显下降;主要由于样本少引起指标数值内部差异相对较小,影响了指标权重的确定,在今后研究中仍需不断完善;另外,在考虑农户生计策略动态演变机制时,关注生计策略是如何影响农业的种植结构,是课题组今后工作的重点,也是保障粮食主产区地位、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3) 国家推进粮食安全新战略,提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农地流转快速推进;增强了土地集约利用,使农户呈现非农和涉农的两极分化<sup>[24]</sup>;受限于在最初问卷的设计中缺少具体政策因素的考量,无法在结果中直接体现出来,模型中没有考虑不同时期农业政策塑造农户生计策略变动,需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 5 参考文献

- [1] 李小云,董强,饶小龙,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4):32-39.
- [2] 马聪,刘黎明,袁承程,等.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分化特征及其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8,39(2):316-324.
- [3] 郝文渊,杨东升,张杰,等.农牧民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西藏林芝地区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4,28(10):37-41.
- [4] 郭秀丽,周立华,陈勇,等.典型沙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J].生态学报,2017,37(20):6963-6972.
- [5] Liu Yansui, Li Yuheng.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J]. Nature, 2017, 548(7667): 275-277.
- [6] 杨伦,刘某承,闵庆文,等.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研究综述[J].生态学报,2019,39(21):8172-8182.
- [7] 刘伟,徐洁,黎洁.陕南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研究[J].资源科学,2018,40(10):2002-2014.
- [8] 李翠珍,徐建春,孔祥斌.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2,31(6):1039-1049.
- [9] Gautam Y, Andersen P. 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household well-being: insights from Humla, Nepal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4: 239-249.
- [10] 赵文娟,杨世龙,王潇.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以云南新平县干热河谷傣族地区为例[J].资源科学,2016,38(1):136-143.
- [11] 斯琴朝克图,房艳刚,王晗,等.内蒙古半农半牧区农户生计资产与生计方式研究:以科右中旗双榆树嘎查为例[J].地理科学,2017,37(7):1095-1103.
- [12] 刘晨芳,赵微.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基于 PSM-DID 方法的实证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18,33(9):1613-1626.
- [13] 李立娜,何仁伟,李平,等.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空间差异: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J].山地学报,2018,36(5):792-805.
- [14] 王娅,周立华,陈勇,等.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的关系:以宁夏盐池县为例[J].生态学报,2017,37(6):2080-2092.
- [15] 赵雪雁.生计资本对农牧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J].地理研究,2011,30(4):687-698.
- [16] 汤青,李扬,陈明星,等.半城镇化农民可持续生计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8):1022-1030.
- [17] 赵雪雁.地理学视角的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问题与领域[J].地理研究,2017,36(10):1859-1872.
- [18] Fang Yiping, Fan Jie, Shen Maoying, et al. Sensitivity of livelihood strategy to livelihood capital in mountain area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ifferent settlement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Minjiang River, China [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4, 38: 225-235.
- [19] 王凯,李志苗,易静.生态移民户与非移民户的生计对比:以遗产旅游地武陵源为例[J].资源科学,2016,38(8):1621-1633.
- [20] Loison S A. Househol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gender: panel evidence from rural Keny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9, 69: 156-172.
- [21] Ward P S. Transient poverty, poverty dynamics, an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a balanced panel from rural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 2016, 78: 541-553.
- [22] 吴园庭雁,杨君.农户生计策略演变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基于湖南省 291 家农户的调查[J].湖南农业大

-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18(2): 65-69.
- [23] Ulrich A, Speranza C I, Roden P, et al. Small-scale farming in semi-arid areas: livelihood dynamics between 1997 and 2010 in Laikipia, Keny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28(3): 241-251.
- [24] 陈良敏, 丁士军, 陈玉萍. 农户家庭生计策略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CFPS 微观数据 [J]. *财经论丛*, 2020(3): 12-21.
- [25] 马定国, 刘影, 陈洁, 等. 鄱阳湖区洪灾风险与农户脆弱性分析 [J]. *地理学报*, 2007, 62(3): 321-332.
- [26] 王强, 黄河清, 郑林, 等. 鄱阳湖区农户经济行为变化对农业系统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0, 25(3): 511-521.
- [27] 李鹏, 肖池伟, 封志明, 等. 鄱阳湖平原粮食主产区农户水稻熟制决策行为分析 [J]. *地理研究*, 2015, 34(12): 2257-2267.
- [28] 张亮, 丁明军, 殷悦. 鄱阳湖平原耕地撂荒现状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8, 42(1): 38-44.
- [29] Tian Qing, Lemos M C. Household livelihood differentiation and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hazards in rural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08: 321-331.
- [30] Tian Qing, Guo Liying, Zheng Lin. Urbanization and rural livelihoods: a case study from Jiangxi Province, Chin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577-587.
- [31] 张丽萍, 张镜铨, 阎建忠, 等. 青藏高原东部山地农牧区生计与耕地利用模式 [J]. *地理学报*, 2008, 63(4): 377-385.
- [32] 王一超, 郝海广, 张惠远, 等.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 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8, 33(2): 302-312.
- [33] 王成超, 杨玉盛. 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 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1, 31(11): 1362-1367.

## The Dynamics of Farmers' Livelihoods in the Lakeside Area of Poyang Lak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AO Minzhen<sup>1</sup>, ZHENG Lin<sup>1\*</sup>, LI Peng<sup>2</sup>, TIAN Qing<sup>3</sup>, XU Jiaping<sup>1</sup>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College of Science,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22030, USA)

**Abstract:** With household interviewed data collected in seven sample villages of Yongxiu, Xinjian, De'an and Lushan counties in the Lakeside Area of Poyang in 2007 and 2018, based on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some methods including the Participatory Rural Assessment (PRA),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ndex, proportion of dominant livelihood income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the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ir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result shows that near-city villages in the Lakeside Area of Poyang have more livelihood advantages than far-city villages. The livelihoods of local households in the study area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ith larger proportions of natur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However, the stock of physical capital reduces and human capital, especially education, also shows poor. Non-farm incom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local households.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outgoing workers and that of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household, indicating that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tend to be diversified and non-farm. Affected by agricultural polici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off-farm engagement of local households gradually change from a single natural capital to a combination of natural capital, materi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In addition, human capital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in non-farm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it affects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non-farm farmers together with physical capital. The livelihood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Lakeside Area of Poyang not only depend on the family's livelihood capital, but also are affected by the national land policy an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 livelihood; farming households; livelihood dynamics; influence factors

(责任编辑: 曾剑锋)